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8.06.024

从经济伦理的视域再论《货殖列传》的 义利互存及教育价值

刘静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史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现代人在资本逻辑的导向下习惯将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是在如此语境中,经济伦理作为一种思想上的不甘,从经济原则至上的逻辑当中凸显出来。《货殖列传》内容极其丰富,从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论述了别样的经济观点,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司马迁的义利观和道德伦理观念。尤其是司马迁对“商”的表述,他赞同商业的存在,同时又没有将“利”置于最高的价值顶峰。将从“商”之伦理突显、价值体现以及德性彰显对《货殖列传》的义利互存进行探讨。

关键词:义;利;货殖列传;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8)06-0126-05

资本逻辑在全球各个领域不遗余力的演绎和深层次的拓展致使经济原则不断强制性地甚至无节制地吞噬我们的现行世界。现代人习惯经济至上的生命逻辑,将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是在如此语境中,经济伦理作为一种思想上的不甘,从经济原则至上的逻辑当中凸显出来。经济伦理不单单要关联到国家在经济上的全局性调控,更牵涉企业在从事生产、销售、广告等行为时在道德层面的认可度及底线约束,而且也涉及个体的道德底线。道德标尺不只是指引、向导、控制欲望,更重要的是,它将理性融入非理性的欲望当中,对恶进行一定程度的规避。无论什么社会,如要获得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它则必须将群体意识与规范和社会因素相结合。建立一个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认可的价值观念,或是规定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伦理标尺,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货殖列传》作为司马迁的“瑰丽”之作,其内容千汇万态,从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论述了别样的经济观点,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他的义利观和道德伦理观念。尤其是司马迁在当中对“商”的表述,他赞同商业的存在,同时又没有将

“利”置于最高的价值顶峰。他就主张将理性的“义”与非理性欲望合适地融合,从而追寻理性的“利”。本文将从经济伦理的视阈对其义利之辨进行探讨。

1 “商”在伦理中凸显的语境: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义与利相互转换的条件

“安贫乐道”是中国人的君子之求,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孔颜之乐都是用标榜的态度来对待,以彰显儒家对理知的追求。其实孔子还有一句话,“富而好礼”,即在物质富有的状态下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富与贫本就是生活的一种状态,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显然“贫”的状态居多,这便养成了以“固贫”为特色的君子势态,加之以治民为本的农耕文明,其极易忽视治生之道。这导致中国的农耕文明迟迟未向资本的积累转变,中国的商业文明便如石头间隙中的幼芽,明显后天不足,暂难以达到商富国殷民的目标。其实如何将“贫”“富”两种状态都过得不违君子之道才是我们所求的正途。毕竟富好礼,礼需建立在

收稿日期:20180528

作者简介:刘静(1977-),女,湖南郴州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及传统文化研究。

“有”的基础之上。“农本商末”是从时间先在性的角度对从商者其价值位列进行一个整队,这个位列导致我们习惯于轻视商道,然而时间上的先后并不能直接从逻辑上推导出其后位性的存在。其实,“厚民生,兴利源”在任何时候都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在经济上让国民财富值增长,更是为了在人寻求最终的安身立命之所时,能够为此提供有利的支撑。故不可真正让商由于时间顺序而处于因果的“末”端状态,因为“商”在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角色,甚至它资本积累的速度更快,更能让资本增殖。黄宗羲就曾说过,对于统治者来说,“商”可“使其愿出于途”^[1],亦是社会之本。无论是“贫”还是“富”,都需“乐道”“好礼”,这才是理想之生活状态,这亦是司马迁的“至治之极”。

德性是展现生活幸福的必备品质,但在基本的物质财富都匮乏的环境,单纯强调德性的施张,必定对生活一种不充分的呈献,而这种呈献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义者,宜也。”孔子就曾表示,如果富贵是可以获得的,即便是作为弘扬仁义礼智的教师也是不必推辞的,只做到获之有道便可。何为“获之有道”呢?即在寻利的同时,不忘记道德的存在。很多时候经济利益是“礼”在实施过程当中的保障,当然合宜的“义”必然为“利”得以长久的保障。毕竟国家只有富强了,才可来远方之客,只有当温饱解决了,才会注重荣辱德性的修养,从而知礼节。单纯的道德理想、因义舍利的伦理趋向势,必易于与社会现实相矛盾,在“义”的基础之上追求“利”,本该是种合理的趋势,也是一个社会规范制定的物质保证,即“礼”要建立在适当的“有”之上,而最快增加“有”的方式便是“商”。几千年前的史官司马迁就把求利看作人间的正途,因为无论是王还是侯都“尚犹患贫”^[2],就更别说普通百姓了,他们只要不违政治、不危害别人,都可合宜地希求财富。在他看来,求富趋利是人之常性,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因善导之便可,毕竟财货是天地的精华,是生命的脉络,其本身并无对错,错的只是求利的方式。因而,在《货》当中,司马迁在为商人立传的同时,不忘加入道德的期许。例如,白圭追求积累财富之时就折射出自己的商人价值观,能够做到“薄饮食,忍嗜欲”,且能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2]。白圭并没有因富而不仁,或是忘本,相反他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治生的正道。再如,范蠡在

身退之后成了以财富名满天下的陶朱公,他仍能做到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在司马迁的观念当中,生民都能达到富足,才可从根本上解决“义”“礼”的问题,毕竟只有仓廩实了、衣食足了,才会思虑礼节问题,才会关心荣辱状态。当一个人“不厌糟糠”却鄙视财富,如何能以君子“乐道”而悠然自居?又如何能让“道”很好传承下去?毕竟君子是可以爱财的,只要获取的方式合理合礼合法便可。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任何事情都必须建立在吃饭的问题之上,但吃饭并不是一切,这是人与动物的差别所在。当有食可吃之后,便需用适宜的道德理想引导民众,从而繁盛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树立良善的人生态度,即建立起公认的“礼”。因为人性是趋利的,如果没有义的引导,人寻求财富时易被利益遮蔽双眼,执迷乃至沉浸其中,而忘记回归的路。毕竟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当中各种关系的一种,人的行为动机不是简单地维护或是满足个人利益当中对物质或财富的占有,“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权利,他的资产。”^[3]只有人所拥有的财富能够有益于这些时,财富才会引起人的足够珍视,因为财富本身并不是自主的,它只不过是从事社会生活的手段之一,它从属于社会生活、从属于人的欲望。不过,在一个经济关系主导的社会,或由经济统治社会的年代,当经济逻辑成为社会内在衡量万物的标尺时,必然会附带“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所谓“富者,人之情性”^[2],人性的趋利性在很多时候,见利便会裼蹶而前,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人性的内在要求,所以,不能一味地压制人性,以忽略它而寻求完全无利的“德”的存在,这并不是伦理在经济学当中所想表达的意义。孔子曾说过,最好的状态是富而好礼、贫而乐道。既然富能够好礼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那么必然在生财过程中就会诞生对礼的诉求,在求富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对礼的维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2]。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洞察“富”“利”对社会的发展、对文明的推进,就能明晰“有”对“礼”存在的价值意义,合宜的“商”何尝不是一种道德或“义”的体现?

2 “商”之价值的彰显:“商而能之,货畅其流”之义

尼采认为,价值是与生命有关的概念,而要探讨“商”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看它对生命体的有

用性抑或是它存在的合法性,它能为生命的个体做些什么,其价值彰显在何处。不用否认,商之首先便是增加社会财物,即增值。对于一个不事劳作、不事生产的行业如何才能创造财物呢?那便是司马迁所说的“货畅其流”,借加速货殖的周转速度从而产生价值。孙中山先生就曾认为,货物流通顺畅是国富民强的根本途径之一,商是很好的强国之路。因为农工之货必然要运于商旅,否则成为废物,更无财富可言了。自古中国之商业便处于被“抑制”之态,人们习惯性认为从商者不事劳作,无法生产物品,以寄生态而存在,当然没有价值可言。司马迁在重农的年代非常有远见地提出了“商不出则三宝绝”^[2]的口号,他认为这农工商虞四项乃是人们衣食之本,“商”发展好了,小则可使一家富裕,大则可使一国富裕,“商”更能够解决民生问题。如果废弃商家,便会“三宝绝”,其结果可想而知。人不仅仅有着自我幸福的冲动,也有着一个人扩大群体性的社会冲动,要彰显一件事物的德性,单单看对个人的价值增加还是不够的。因而“商”的价值不光是对个人来说,更是对社会而言的,即通过“商”的流通增殖功能,增加社会财富,达到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使国家呈一片欣欣向荣的理想之态。

司马迁为商人修史正名,他认为,无商人的“治生”便无繁荣奔富的社会效益,商的行业道德便体现于利用货畅而方便民众,使国富裕。如果货物不畅通,原本的天生之才也只能沦为废物,人的生产也成为毫无意义的举动,更不要考虑财物能否聚积、人能否富贵、国家能否昌盛的问题了。那如何才能达到“货畅”的效果呢?一是加快流通的速度。司马迁在当时就看到了必须加快资金的周转,以勤劳为本质,加快货物的流通,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个人财富乃至国家的财富。这自然就让“货畅”达到了效果,必然也就实现了“商”的价值所在。二是建立起合适的行业规范来保证“货畅”的实现,从而在货畅中促进社会的生产与进步。行业规则本即为一种伦理诉求。譬如一个新形成的小镇,一个人开了一家加油站,生意很好。第二个人开了一家杂货铺,第三个人开饮食店,很快小镇就会繁荣起来。商人也要体现“成人之美”的君子之好,否则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全开加油站,其结果必是大家都倒闭。换言之,“货畅”要建立在合理的规范之上。单单从技术层面去讨论“商”的“货畅”价值是不够的,否则在发达的金融监控技术下就不会出现金融危机

爆发的现象。商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流通中增加财富,同时也在于它能守住基本的伦理底线,即“商”必须用“义”作为求“利”的德性支撑。行业规范则让商人逐“利”的天性在货物增殖过程中有着“义”的势态,在道德哲学的支撑下更好地发挥“商”的功能,这本身就是商业价值的彰显。

3 “商”之德性的体现:反争利之义——礼教自觉上的伦理支撑

经济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的人类活动,其本质在于利益,换言之,即奠基于“人性是自私”的假设上,以利于自己为主要目的。经济伦理则以形而上的“应当”作为逻辑的基础点,追寻结果上的“至善”。如果仅仅以自“利”作为唯一的先在性进行探讨,那么在经济活动当中的伦理反思必然会沦为一种主义性的文化规劝。完全以经济本能而开展的商业并无德性可言,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缺乏德性的商业并不能做到畅通无阻,从而达到盆满钵盈的状态,毕竟人类社会是一种群体性存在。最理想的状态便是在经济规则基础之上对德性进行彰显,即养利也要做到崇义。商业德性,即处理自己和国家、消费者关系的行为范式。一个商人必须备有相应的道德修养。《史记》中有个故事:在春秋年间,秦准备袭击郑国,“兵到滑”,被郑国的一个商人弦高“遇之”,便自觉“以十二牛劳秦师”,直致“秦师惊而还,灭滑而去”。商人弦高就很好地诠释了在国家之义与个人之利之间的取舍,商人虽然好利,但并不一定要阉然媚世,唯利是图。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好利欲富是人的本性,不管是天子还是庶民都会有欲望,都有着一颗趋利的心。既然“利”的存在是一种原动力,让天下人都趋之若鹜,那么在“货畅其流”的过程中如何做到不任其发展至泛滥之境,如何不让人性负的一面急剧扩大化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对于正当的商业来讲,在增值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对“德”的诉求。其德性便是在合乎道德规则的前提之下为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这即是对合宜商德的一种期求,即以诚实守信、市不豫贾、勤俭经营为基本。“商”所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造财富,更在于用它所缔造的财富去推动文化的发展,去促使社会的进步。孔子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对商业来讲,增殖财富是它的“质”,而对“义”的追求则是它的“文”。“质”代表着欲望与初衷,是

内在人性的一种体现;“文”则代表着理性与最高的追求,是外在德性的制约。在货畅其流的过程中倡导商的伦理诉求,如能成为“富好行其德者”,以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在拥有财富的时候能够乐善好施、爱国守法,这就能达到一个社会认可的层次,可称之为君子了。故此,“商而能之,货畅其流”之价值便在于对“利”的追求上实现“义”的归宿,也是其德性的体现。

4 教育价值:“克己”之下的伦理重构

社会的生命力来自足够的空间和自由,我们不能因为“人类正处在一个丧失了理性秩序和义维度的殖民化生活世界”^[5],就要产生人地危机、人际冲突、人心失衡。因为由人产生的一切恶果最终也必须由人全部承担。当资本呼唤出人类无限的欲望时,会致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断裂,此时必然会要求重构财富与责任,价值与意义便成了诉求的对象。

成利致义,如何让当年的“义”“利”互存充分实现今日的教育价值便成了我们再次重视的对象。即如司马迁所言:“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毋庸置疑的是,“共识”势必产生“合力”。在当今人的伦理构建规则之下,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可最大可能地处领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凝聚出社会共同的范式,以此形成一股合力,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当然获得共识的基本路径只能是将检验真理的实践、能动的创新内化为人们内在的“价值认同”。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太史公认为,有德之人富裕了,必会“好行其德”;平常之人富裕了,则会“以适其力夫千乘之王”。在司马迁的眼里,上到天子下到庶人,都不喜欢贫穷。

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价值观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也是马克思所赞同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当经济增长到相应的水平时,必然会对价值观念产生不同的要求。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为我们解决了贫困问题,现正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大步迈向小康社会,过上富裕的生活。作为小老百姓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里认真负责地活着。换句话说,就是富而后教化之,再达到富而好礼的层面。因此,君子在经济上富足了,便喜好去彰显仁德之性;平常人富有了,就会随心地为社会做他所应当做之事。

伦理以一种理性态度关注世俗的琐事,以价值的判断提供解决现世问题的方向。单就人本性自利的层面分析,民众趋利求富的行为便无可厚非。只要重视道性的修养,以义来保证利的运行,便无可置疑,毕竟货殖只要在规范性下发扬其竞争性,便是有意义的。因为虽然非道德经营架空了道德存在的根基,却没有实现想象中的“利”的最大化。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商业对经济进行伦理与哲学上的反思,由此而导致“义”存在的必要性。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信用是一种无形的资产,犹如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可以为从商者带来一个良性的运行空间,由信用而产生信心,由信心而产生效益。如果只是一味求“利”必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困境,伦理哲学上的迷茫同样会在经济方面引发多米诺骨牌的危机效应。犹如廉吏久富、廉贾归富,单纯的个人利益至上并不能达到真正理想的境界。经济之德便在于富国便民,通过自由的商业活动使国家的财富值得以增长,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生活方便、富足从而达到居安业乐的效果,这便是商之德性的彰显。

大家知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无论哪个阶级的矛盾还是各阶级的斗争归根到底皆由双方“利”上的抵牾与争执所引发。千百年来,生活在华夏土地上的中国人都在追求如何让我们的国家怎样走向富强之路。太史公认为,商业发展致使“富”“利”的出现,这是个自然势态,也是人们对富足安康的追求的人之天性。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为维护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体系能在根本上达成一致并调节那些非对抗性的矛盾,以促进我国在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不断迅速发展、社会及其成员之所需也能得到逐步满意的重要原则。用中国式话语解读,就是在建立起“礼”“义”的自觉之下追求“利”的最大化。

司马迁提倡根据社会实际,将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商的生产是社会的必然,而这种必然又必须符合道德伦理的规束,这本就是一种“克己”之下“礼”“义”的自觉,也是一种伦理道德的重新构建。即既肯定人们在逐利的过程中不能违背“义”的平衡性,也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货殖列传》的义利互存既关乎国家的物质观,也是国家德性标尺的体现,它对“义”的追求对今天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的培养具有

很大的借鉴意义。

5 结语

由于改革纵向深入,我国在经济上的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过往简单的崇尚道德伦理的观念逐渐不能满足今天经济成长的需求。市场经济的效率论让传统伦理的内容有些无措。当下对伦理的诉求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来满足人在经济逻辑下对财富的追求,同时又为人提供相应的思想资源。这便要求人要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精神健全的、完整的人,即在理性主导下诞生伦理的觉醒。

道德意志及力量表现为感性的行为和实践,其真正的主旨却是一种刚性,或者说是理性的凝聚,天地以至诚来衍生万物,人只有心存忠信,才能得到天的助顺,才可以立足于天地之间。最为常态的伦理要求为“内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4],这也是理性对感性的主宰和支配。

当然,我们在利与义的抉择当中必然会遇到相应的难题。譬如:经济的主要体系暂未完整地构建,而道德评价的对象也只是限定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和品德,这样会引发经济主体不够清楚,同

时道德承担者也明晰不了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义”与“利”互存问题,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给我们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如何针对义利取舍的蓝图,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如何在刚性的“义”下控制好“利”的取舍本也是道德理性的根本,追逐合理的“利”在今天便是道德理性的一种彰显,即在逐利过程中让心灵的良知得以呈现。

参考文献:

- [1] 黄宗羲全集(第1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2] 司马迁. 史记[M]. 萧枫,主编. 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
- [3]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4] 刘宝楠. 诸子集成·论语正义[M]. 长沙:岳麓书社,1996.
- [5] 毛勒堂.“经济时代”与经济正义[J]. 道德与文明,2011(5):31-36.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Coexistence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and Educational Value in *Biography of Engaging in Trade* from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Ethics

LIU J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5624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apital logic, modern people tend to consider the value system focusing on “economy” as the guideline. It is in such a context that economic ethics stands out from the logic in which the economy principle is all. This book discusses different economic points of view from such aspects as astronomy geography,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and shows Sima Qian’s idea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and moral and ethical concept, especially his statement of “business”. He agreed with the existence of business and he didn’t think “benefit” was the top on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existence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in *Biography of Engaging in Trade* from the following respects: the ethnic, value and virtue of “business”.

Key words: righteousness; benefit; *Biography of Engaging in Trade*; economic ethics

(责任校对 蒋云霞)